

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文物陳列館

## 2010年通俗演講

# 「胖貓」與「小耗子」

潘光哲

(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． 副研究員 )

# 「胖貓」與「小耗子」

潘光哲

(台灣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·副研究員)

在廿世紀中國學術界裡廣受推崇（當然，也頗受批判）的錢穆，著作等身，也擁有廣大的讀者群。在錢穆的眾多著述裡，《八十憶雙親·師友雜憶合刊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3）回顧紀錄了不少現代的學人風采與學林往事，深富興味。可是，即如錢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時的述說，這部書的文字「太潔淨、太含蓄了」，因此，「讀者如果不具備相當的背景知識，恐怕很難體會到他的言外之意，更不用說言外之事了」（余英時，〈猶記風吹水上鱗〉，收入：氏著，《猶記風吹水上鱗——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》〔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1〕，頁13）。例如，錢穆對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以下簡稱史語所）創所所長傅斯年（孟真）的一些回憶，就很有意思，頗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間。錢穆的回憶裡，有這麼一段話：

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，彼【指傅斯年——引者按】必網羅以去，然監督甚嚴。有某生專治明史，極有成績，彼曾告余【錢穆——引者按】，孟真不許其上窺元代，下涉清世。然真於明史有所得，果欲上溯淵源，下探究竟，不能不於元清兩代有所窺涉，則須私下為之。故於孟真每致不滿（錢穆，《八十憶雙親·師友雜憶合刊》，頁147）。

所謂「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」，傅斯年「必網羅以去」，確是歷史實情。正如史語所創所元老之一，後來也接任所長的考古學大師李濟的指陳，傅斯年專門鑄造了「拔尖主義」一辭，意指網羅各大學歷史系的高才生，加入史語所的研究隊伍，「往往使各大學主持歷史系的先生們頭痛」（李濟，〈值得青年們效法的傅孟真先生〉，收入：

氏著，《感舊錄》〔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67〕，頁69）。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鄧廣銘的回憶，傅斯年自身與史語所同仁於一九三〇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學系兼課，既是培英育才，「要把金針度與人」，也兼有直接為史語所考評選拔新血的用意（見：鄧廣銘，〈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〉，《台大歷史學報》，第20期〔台北：1996年11月〕，頁8）。

至於錢穆說傅斯年對進入史語所的這批新秀「監督甚嚴」，基本上也非憑空虛構之論。蓋若傅斯年對史語所的新進青年，立下的第一條「規矩」，就是「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」。甲骨學大師董作賓就比喻說，這乃是傅斯年對青年學者的「下馬威」。董作賓也指陳說，平素相處，傅斯年對這群小青年確實「管理又是很嚴的」。例如，有一次，一位助理員某君在院中散步較久。次日，傅請別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曬太陽，偏偏就是不讓某君出門，還向他說：「你昨天已經晒夠了」。因此，董作賓說，史語所的這幫青年學人，對傅斯年固然「愛之敬之而且畏之」，但是，只要受過傅斯年的「訓」的人，

「敬」同「畏」卻又壓住了他們的「愛」。

史語所避徙四川李莊的時候，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，往來於重慶、李莊之間，一旦回到李莊，這幫青年學人的行止動作，便大有不同，特別對他，好似「敬而遠之」。傅斯年不在李莊時，由董作賓代理主持所務，這群青年和這兩位「領導」相處，態度舉止大大不同，讓傅斯年「大惑不解」，他就問過董作賓箇中原由究竟何在：

他們立在院內或大門口，一群人有說有笑，你去了，加入擺一套龍門陣，我去

了，他們便一個一個，悄悄溜了，這是為什麼？

董的回答是：

這正是我無威可畏，不如老兄之處。

傅斯年聽罷，只得「長吁了一口氣」。也難怪同樣在李莊的研究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，會對董作賓說：

胖貓回來了，山上淘氣的小耗子，這幾天斂迹了（董作賓，〈歷史語言研究所在

學術上的貢獻——為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，第2

卷第1期〔台北：1951年1月〕，頁3-4）。

陶孟和將身材肥胖堪稱「重量級學者」的傅斯年比喻為「胖貓」，相當傳神；他把史語所這群青年學人視為避「胖貓」惟恐不及的「小耗子」，則更若眾口鑠金之論，在學界

傳頌不已。像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的中韓關係史專家張存武就回憶曰，系裡的資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揚名的方豪，總是「笑嘻嘻地說」，出身史語所的秦漢史大師勞幹看到傅斯年「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」（張存武，〈浮光掠影憶校長〉，收入：布占祥、馬亮寬〔主編〕，《傅斯年與中國文化》〔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6〕，頁18）。

這樣看來，傅斯年對史語所的新秀，確實「監督甚嚴」，他的作風，往往也讓這批青年俊彥心生懼畏，「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」。可是，傅斯年對青年學人的「監督」，會嚴厲到連他們的讀書範圍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嗎？

返觀歷史本來場景，錢穆所說的這位既是「北大歷史系畢業」而且「專治明史」，又被「拔尖」進入史語所的「某生」，應該就是王崇武。王崇武在一九三二年進入北大，與日後史壇名家鄧廣銘、張政烺、傅樂煥以及王毓銓等人是同班同學，他與鄧、張及傅三位，更被稱為北大的「四大傲人」（見：張德信，〈王崇武的明史研究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，第80卷第5期〔台北：1990年5月〕，頁6），正可揣想其青春風采。王、鄧、張、傅四位會被冠以這樣的「雅號」，其來有自，蓋風華正茂的他們，還沒戴上學士方帽之前，都已經各在學術上繳出可觀的成績單。

以王崇武來說，就讀北大期間，他就已經在顧頡剛創辦的《禹貢》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明代史事的專業論文。像是王崇武對於明代屯田制度的研究，成果豐碩，近四十年之後，台灣的明史專家徐泓教授檢討評述這一課題的研究，就特別介紹了他的多篇論著（見：徐泓，〈六十年來明史之研究〉，收入：程發軔〔主編〕，《六十年來之國學》〔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74〕，第3冊，頁396-397）。可以想見，還只是大學生的王崇武，苦心完成的研究成果，確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不過，王崇武在一九三六年畢業之後，卻先擔任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助理員，至翌年方始加入史語所的队伍。

王崇武進入史語所之後未幾，就遇上了「蘆溝橋事變」，從此隨之轉徙飄泊西南天地之間。面對戰亂變局，王崇武「胸懷抑鬱，無可發洩，只有靠讀書來排遣」（張德信，〈王崇武的明史研究〉，頁6），埋首史籍，耕耘不輟。因此，顧頡剛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點評中國史學研究的業績，指稱在明史研究領域裡，王崇武和吳晗的「貢獻為最大」（顧頡剛，《當代中國史學》〔南京：勝利出版公司，1947〕，頁93），正展現他的學術業績，已然深受學界肯定。

仔細檢討王崇武這一時期的論著，對於明清易代之際史事的求索，亦是他的研究重點之一。眾所周知，研治明清易代之史，甚為困難，「欲纂修南明清初歷史，非博求野史，加以選擇，互相印證不可」（謝國楨，〈明清史料研究〉，收入：氏著，《明清筆記談叢》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〕，頁180）。那麼，王崇武向這個領域「進軍」，如未廣涉清代史書文獻，恐怕難能有所成就。如王崇武考證《敬修堂釣業》一書的作者是明代遺民查繼佐，蒐索史料，羅掘俱窮，考證細膩，令人嘆為觀止。像是為了證明查繼佐的父親名喚大宗，母親姓沈，他引證了黃石齋（黃道周）的〈沈爾翰傳〉等

資料，還特別註明日：這篇〈沈爾翰傳〉的來源「據沈氏《年譜》引，清道光福州刻本黃《集》無此傳」(王崇武，〈查繼佐與《敬修堂鈞業》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，第10本〔1948年〕，頁596)。顯然，王崇武引徵黃道周〈沈爾翰傳〉的時候，必然查覈過清朝道光年間福州刻印的黃氏《文集》，卻毫無所得，只好從沈爾翰的《年譜》轉引。舉此一例，即可揣想，王崇武非僅廣閱史籍，甚且讀書精細，校覈史料，絕無輕忽。

傅斯年嘗言：

**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，歷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決定。後人想**

**在前人工作上增高：第一，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；**

**第二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(傅斯年，《史學方法導論》，收入：《傅**

**斯年全集》〔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0〕)，冊1，頁58)。**

因此，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「私下」場合窺涉元清兩代之史籍的可能；一旦他能以「細密」、「確切」的態度來追索訪求史料，並進一步地開展考證工作，探索史事，業績確實牢靠，對他「整理史料」的高強本領，傅斯年應當只會領首稱譽才是。否則，傅斯年如果真要「令出必行」，看到王崇武的這篇文章居然引徵清代史籍，違反他的清規戒律，那麼它也不可能登諸《史語所集刊》了。

就別的例證來說，史語所裡的青年學者，要讀些什麼書，應該都是自己決定的。像是以魏晉南北朝史為專業領域的周一良，比王崇武稍早進入史語所，當他入所之後，固然以魏晉六朝諸「正史」做為研究的主要史料來源，亦復涉讀批覽在此範圍之外的《金石萃編》、《資治通鑑》等等相關史料或史著；至如清代學者錢大昕《廿二史考異》、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等等考證成果，也是他閱讀「正史」必同時檢閱參照的著述。在一九四五年才進入史語所的嚴耕望，則以中國政治制度史和為人文地理兩大範疇為研究主題，唐朝歷史也是他主要投注心力的研究領域。但是，為了要對治唐史有所幫助，嚴耕望自稱還是「把《宋史》自頭至尾，自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相當認真的看了一遍」(嚴耕望，《治史經驗談》〔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1〕，頁15)。

這樣說來，即令傅斯年對史語所的這幫青年學者確實「監督甚嚴」，就平素往來應對的生活面向而言，這批青年或許也確實是害怕懼畏傅斯年這頭「胖貓」的「小耗子」。只是，在知識探索的天地裡，如果傅斯年真想要發號施令，決定他們在史料的海洋裡尋尋覓覓的工作方向和範圍，恐怕必有力不從心之嘆。對學術權威唯唯諾諾的人，不會在知識生產的天地裡，創生出任何實質的成果。王崇武的學術業績，證明了他絕對不是容許「胖貓」頤指氣使的「小耗子」。